

# 天津：那些人，那些地儿，那些变化

本报记者 严冰

一座城市如果与你的任何经历无关或是没有任何朋友，那么，你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就会大打折扣。天津，对于我，则不然，因为，这里虽然既不是我的祖籍地，也不是我的出生地，但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。

儿时居住的楼后，有一条大河，听郭兰英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时，我总是想到这条河。后来读了书才知道，这条河和长江黄河一样著名，是借着鬼斧神工人工开凿的大运河的一部分，叫北运河，是旧时南粮北运的漕运通道，著名作家刘绍棠以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创作了《蒲柳人家》等不少文学作品。我生活的上个世纪70年代，早已不见漕运的帆影，但河上一座年久失修的吊桥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桥上的木板已经斑驳脱落，走在上面，望着桥下晃动的河面，总是让人胆战心惊！

今年大年初五，我就是沿着这条河回到了既陌生又熟悉的第二故乡。

回乡之缘起自小学同学的聚会。一见面，同学克勤就指着我问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听到别的女同学的答案，他竟然喊着我的名字吃惊地大叫起来。这就是久别重逢的惊喜！因为这些年我虽然多次回来，陆陆续续见了不少同学，但克勤还是第一次见。时隔32年，正是：“别梦依稀游逝川，故园三十二年前！”见面聊起儿时一起玩游戏：骑马打仗、撞拐、弹球、烟盒、纸宝、糖纸……虽不登大雅之堂，却也趣味无穷。

聚会的地点就选在同学小海开的酒楼。儿时，小海兄弟姊妹4个，全靠父亲一个人34元的工资，生活拮据，我亲眼看到他，一碗米饭，倒点酱油，开水一泡，就是一顿饭，如今自己开起了大酒楼，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。

教数学的马老师也赶来了，当时的大小伙子，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，精神依然是当年在课堂上那么健朗。儿子在北京中关村

找了个好工作，如今就盼着抱孙子了。我的母校二号路小学如今是趋之若鹜的好学校，据说择校费颇为不菲。当年开门办学、建校劳动，为贫下中农打算盘，拾粪拾旧钢铁等活动，带着时代的印记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小学同学从事的职业很杂，有区环保局干部、街道办事处书记、警察等基层公务员，有央企中层领导、车间主任，有医生、教师，有个体老板、厨师，不论职务高低、境遇如何，“发小”永远是“发小”，谁求到谁，办事不用送礼。

推杯换盏之间，觥筹交错之际，多年或多年不见的拘束不见了，谈起儿时的好时光，欢声笑语，激情洋溢……

沧桑带给人们的除了生活改善的喜悦外，也附着着岁月流逝的怅惘，就像那条河。令人胆战心惊的吊桥不见了，换成了崭新的梁桥，可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还有，河水也不如儿时干净，那时夏天，北运河就是我们的游泳池，可现在，没人敢下河游泳了。

重逢倍觉短暂，分手时不禁想起父亲年轻时在北运河留下的诗：“历史像滚滚的长河，一泻千里，前人走过的路，只留下脚印。你，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用自己生命的火花，照亮那滚滚向前的历史。”人到中年，人生过半，想做的事还很多，离长辈的期待还很远，大家以此共勉，相约明年再见！



天津北运河

# 回乡偶书

故乡，或生于此，或长于此，必定是人们情感的凝结之地；离家，或奔向繁华，或归于僻壤，总会获取新的视野、新的感悟。因此，离家之人回望故乡，渗透着情感的思索，会下意识地流泻而出。本报从去年开始，开辟“回乡偶书”专版，组织回乡记者观察故乡、感受故乡、思考故乡。今年我们再次推出两个专版，聚焦变化中的村落、城镇，展示成长中的中国。

## 故乡，在蜕变中生长

陈振凯

在中国和汉文化圈，2013年属蛇。成语词典里，有关蛇的成语，褒义的不多。但蛇的“蜕变”，却是一种值得人类极为珍视的能力——尤其，对于2013年，对于这一年的中国。

因为，这一年，属于“蜕变”。本报多位记者回乡探访，异口同声地用一个字描述了对故乡的感受，那就是“变”。今年最大的变，是风气。风气在“蜕变”。2013年春节前夕，中央力倡节约，高调反腐，并摆明了春节期间不会松动。“光盘”成为光荣，打包变得流行，开公车去景点被拍，喝酒成风不再行得通……这种变化，让人气顺。

空气要“蜕变”。雾霾天，要听响还是要健康？31天的1月份，北京有26个雾霾天，要不要放鞭炮的疑问，春节前夕越来越响。北京市的数据是，过年期间，鞭炮烟花销量下降近5成。GDP增减几个小数点，一年只需考虑两次，空气则要天天呼吸，人人关心。

思路要“蜕变”。2013年初，一些地方，提出“两只鸟”，凤凰涅槃，腾笼换鸟——产业升级与转型。产业蜕变，背后是思路之变。新的5年甚至10年，要实现“全面小康”、“收入翻番”，建成“美丽中国”，发展思路要变。

年关年关，过年是关。要蜕变，就要过关。过人情关，烟酒关，面子关……甚至侥幸心理关。当“变化正在发生并必将更大发生”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时，有人不学蛇的“蜕变”，反而学蛇的“虚以

委蛇”——三令五申不让送礼，我偷摸陪着来，结果被抓。三天两头强调自律，我还公车私用，结果被抓。

……微博上，饭桌上，人们讨论着“某县某局长省会送礼被抓现行”，热议着某警局某军区豪车车牌清晰被拍……当变化发生时，总难免有一部分人侥幸，试探，并“撞上枪口”。

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变则通，通则达，达则久。变是永恒的不变，这是古人讲了几千年的道理。2012年底，中共中央换了新的领导集体；2013年两会，中央政府即将换届。十八大里，新的思想层出不穷；十八大后，新的作风扑面而来。不论小环境，还是大趋势，2013年属于“蜕变”。

蛇的“蜕变”，往往痛苦；凤凰涅槃，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国家和民族的“蜕变”，同样不会一帆风顺，难免阵痛。既要蜕变，国家便做好了承受蛇的痛苦。

“蜕变”是个方向。但每个地方、每片阳光、每只鸟儿，不会自动去变，所有变化的背后，都靠人的推动。

这个国家13亿人，每个人学习蛇的蜕变，国家才真拥有了“蜕变”的力量。

这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土地，每个乡镇、每个城市践行蛇的蜕变，国家便可不断前行。

# 宁海：“马上办”巧治“机关病”

本报记者 张意轩

春节期间，随先生到浙江宁海过年，与几个新闻同行聊天。“宁海有个‘百姓事马上办’，还真顶事儿。”“跟2011年媒体热议的山东济宁‘马上就办’办公室”一样吗？县里搞这个不会是作秀吧。”“不是作秀，不信你去看看。跟山东的主旨类似，但形式别具一格。”

出于好奇，决定一探究竟——点开“宁海新闻网”的“百姓事马上办”，百姓反映的问题一览无余，内容有投诉政府不作为、乱作为的，有举报老板欠薪、黑作坊的，也有治堵、教改等建议……每一位百姓的诉求都有“贵堵、教改等建议……”每一位百姓的诉求都有“贵堵、教改等建议……”每一位百姓的诉求都有“贵堵、教改等建议……”

制保障职能部门全面参与，若问题没有“马上办”会对部门产生什么影响？带着疑问，记者找到了春节值班的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建云。

据介绍，“百姓事马上办”是县委办与宁海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，力求“事事有回音，件件有落实”。2011年6月，新平台开始运行，所有来信、来电、来访、发帖的百姓诉求都呈现在该平台。每个职能部门有一个分管领导和一名工作人员与其对接，对百姓诉求限5日内回复和办结，办结后会有手机提醒将结果呈送给诉求人和受理部门。若问题碰到拖办，就会接到纪委的“催办单”，当地媒体就会跟进报道监督，百姓的评价也将计入部门考核，考核不达标，将扣减部门全员绩效工资，还影响部门年度排名。

“谁工作不力，影响部门其他人的收入，个人压力很大；年度排名落后，部门领导压力就大。”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道出了职能部门重视该平台的原因。宁海新闻中心副总编辑侯德勇说：“如果不解决问题，不仅这条帖子会一直挂在网上，紧接着就有新闻报道要登出来，对职能部门来说，社会压力不小。”

对宁海群众来说，“百姓事马上办”成了“有求必应”的代名词。截至今年1月底，“百姓事马上办”共受理群众各类咨询和投诉12327件，帮助解决群众实际问题6000多个，群众满意度高达95%。同时全县信访发生率则出现明显下降。王建云表示，许多官员将舆论监督视为“找麻烦”，其实舆论监督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。对宁海来说，“百姓事马上办”将来不仅是舆论引导的工具而且还是各职能部门的行政主战场之一。

2月16日，节后上班第一天。记者在2月7日一条讨薪求助帖后看到该县深村镇的回复：“所反映问题已解决。”



“百姓事马上办”网站

丢弃死猪，致使河水泛黄，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。1月18日，县住建局回复到：“经与投诉人取得联系，明确地点后前往，现该处死猪已被清理”。该网友于24日做了“满意”的评价。同是县住建局，在处理1月23日网友“天景园”投诉物业服务不当时，尽管“物业服务中心已与业主沟通解决”，但是仍然收获“不满意”的评价。像宁海这样敢于网上亮“家丑”的，还是不多的。凡是能上网的地方，都能看到宁海人的烦

# 烟台：从田间到车间

本报记者 潘旭涛

今年42岁的张中伟是山东烟台天航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，而10年前的他，是一位“失地”农民。离开土地后的张中伟从生产工人干起，经过十年的奋斗，一步步跻身公司管理层。张中伟的故事发生在烟台福山区福新街道，而故事的背景是福新街道的城镇化探索。

福新街道所在区域原本多是农地，从2002年开始，福新街道办开始了以“以工带农”城镇化模式。政府投入资金建设集中居住区，农民搬进居住区后，腾出的土地用于建设工业产业园区。产业园一方面可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，另一方面又大幅增加当地财政收入，增加的财政收入再转化为民生投入。

当地年轻人除了自己做生意外，几乎全部进入园区工厂工作。为了让农民顺利从田间转移到车间，当地政府送去福山技工学校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习的本地学生，每人每年补贴500元。

经过10年的努力，在福新街道办21.4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密布着200余家企业，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、电子信息、特钢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。2002年，福新街道办的工业总产值只有4744万元，到2012年已超过62亿元，是2002年的130倍；2002年国税和地税总收入1208万元，到2012年跃升至2.43亿元，是2002年的20倍；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602元增加到2012年的1.47万元。

“以前种地收入太少，还要靠天吃饭。现在我每年在村里做8个月的防火工作，收入五六千块钱。剩下的时间干点装修的活儿。”黄泥沟村的张传河老人对现在的

生活很满意。老人拆迁补偿了三套房，他开玩笑地说：“孙子的房子都有了。”

福新街道的做法是烟台普遍采用的城镇化模式。烟台是一座工业城市，2010年，烟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万亿。因此，依托工业成为烟台城镇化的捷径。

烟台市副市长于松柏将烟台的城镇化道路概括为“功能区带动型”，即通过发展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工业产业园区、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等功能区，促进产业、要素、人口聚集。烟台市建局局长邹长清认为，烟台的城镇化既改变农民生活方式，又变革农民生产方式，可以实现“表里如一”的城镇化。

烟台的城镇化在功能区的驱动下快速前行，城市化率达到56.07%，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。



烟台福山区福新街道

# 新泰：家常不寻常

本报记者 尹晓宇

腊月二十六，回了趟父亲的老家，山东新泰一个普通的农村，虽然我不是在那里出生长大，但小时候寒暑假时都要回去一下，那个村子里自有我的记忆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进村的路总是显得很长，多半都是走路，没什么交通工具，主要的是一辆摩托车和自行车，好一些的家庭会有一辆摩托车或是拖拉机。经过漫长的田地后，会见到一头黄牛一边吃草一边甩尾巴，那就是正式进村了，村口总是有一排老人坐在墙根下靠着墙晒太阳，许多时候我的曾祖父也在这里。

那时少有人出去打工，盘算的是一亩地打出多少粮食，喂了多少头猪。那时常会停电，家里还有煤油灯，有电

视机的家庭还不多。那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。每年的拜年也是极有讲究，奶奶说拜年前先去谁家再去谁家是有规矩的，女眷则要在男的拜年后才能再去。年初二时，村里一个族的要聚在村口，辈分最大的在前面，各家端着簸箕，里面盛着东西，鞭炮噼里啪啦地要放一个小时，还有一个主持仪式的，这是送家堂。

记忆在村子的柏油路、两层的小楼房、小超市里变得陌生。村里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，济南、青岛、山西、北京甚至新疆，挣多少钱成了大家最聊的话题。拜年的规矩则逐渐变得淡淡，讲究越来越少。

老家还有一些亲戚，中饭是在舅姥爷家，即将毕业的表叔谈论着找工作的事，“考公务员或者当老师吧。”他不想离家太远，还是想在山东，对于就读于一般本科的农家子弟来说，如何让四年的苦读和家里的花费不打水漂，是个大事儿。舅姥爷是退休的小学老师，去年家里有事让他很得意，从锁着的抽屉里，他拿出两本厚厚的大书，我接过来，是家谱，舅姥爷姓孔，一个让他们家族很骄傲的姓氏，家里也是以读书为最重要。家谱上有几个舅姥爷的记录，我念给奶奶听，“连大哥家的孙子辈都续上了。”舅姥爷跟奶奶说，这是大事。